

# 石頭上的中國畫



武氏祠漢画像石的故事詮釋

■ 胡广跃 著

陕西出版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 石頭上的中國畫

武氏祠漢画像石的故事詮釋

胡廣躍 著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头上的中国画：武氏祠汉画像石的故事诠释 / 胡广跃著.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518-0640-4

I.①石… II.①胡… III.①武氏祠画像石—研究  
IV.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436号

---

石头上的中国画——武氏祠汉画像石的故事诠释

---

胡广跃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群艺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640-4

定 价 6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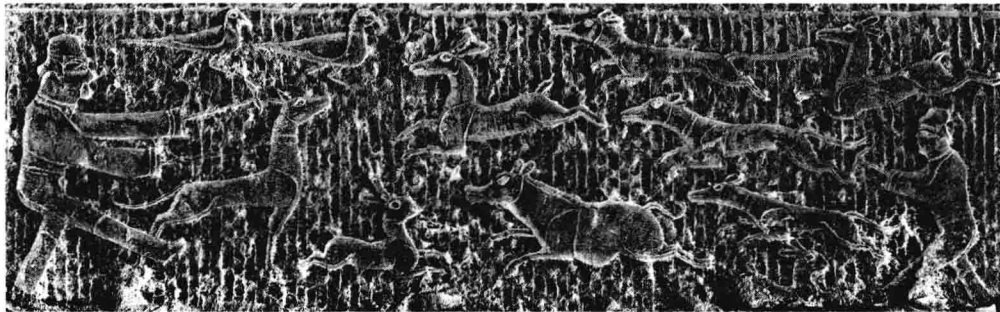
---

网 址 <http://www.sqcbs.cn>

## 绪 论

汉画像石是汉代墓室、墓地祠堂以及地面石阙等建筑物上的石质构件，有着深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汉画像石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几乎涵盖了汉代社会生活、观念信仰的各个方面，为历史考古、文化艺术、民俗风情以及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提供了直观而又形象的资料。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说：“我以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他认为汉代石刻画像是一种最真确的史料，“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地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石头上的中国画就是指两汉时期的“艺术家们”以刀代笔以石为纸的艺术作品。

济宁是山东省发现和保存汉画像石最多的地区，也是全国汉画像石的重要集中分布地之一。不仅出土量大，保存多，而且发现最早。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中就有金乡鲁峻祠堂石刻画像的记载。宋代金石学家欧阳修、赵明诚等都曾亲临鲁地，探查研究武氏祠石刻画像，并将成果收录到各自的著作中。清代黄易、翁方纲等遍访济宁，查访保护了不少汉画像石刻，尤其是黄易对武氏墓群石刻的发掘与保护，引起了世人对画像石的重视和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工作者通过



武氏祠汉画像原石图像之一

考古、调查发掘，收集出土了一大批汉画像石。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济宁市全区已清理发掘的汉画像石墓约 80 座，收集和出土的汉画像石总数约 1300 余石。这些画像石几乎分布在济宁所有县市区，以嘉祥、微山、邹城、曲阜最多，占全市总数量的三分之二还多。关于本地区的汉画像石，以往有不少学者曾报道研究过，也出版过一些图集，但对全区汉画像石的面貌特点和发展脉络等方面，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为此，笔者试对济宁全区汉画像石历史背景、分布、分期、画像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探讨。

## 一、济宁画像石墓产生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 206 年，汉朝建立后，在中央仍承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则实行州、郡、县和诸侯封国制度。西汉时，地方行政建制为郡（国）、县两级制，郡国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东汉实行州、郡（国）、县三级制，郡国成为地方中层行政机构。西汉时期的济宁地区，既有郡、县，又有封国，境内设置治所的有一郡三国，跨济宁境的有二郡一国，分别为山阳郡、东郡、东海郡、鲁国、东平国、任城国，所含县与侯国 17 个。



郭里镇高李村出土车马战阵画像石

济宁原名为任城，秦时为任城县，属薛郡。西汉仍设任城县，属东平国。到东汉时实行州、郡（国）、县三级行政机构。郡国并行，凡分封诸侯王的区域设国，直属朝廷管辖。任城县改设为任城国，仍属东平国。位于济宁市城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萧王庄墓群，即为任城国王及其后妃的陵墓。其中，一号墓主人任城孝王刘尚为光武帝刘秀之孙。刘尚是东平国宪王刘苍的次子、东平怀王刘忠之弟。按汉律，东汉藩王诸子按例封列侯，刘尚以藩王次子晋封王爵，这在东汉不多见。另外，还先后封刘苍的五女五男为公主、列侯。和帝时，封刘苍孙六人为列侯，一人为亭侯。安帝永宁元年（120年），又封苍孙二人为亭侯。这一方面体现了章皇帝意图分化东平国势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朝廷对东平宪王刘苍所作贡献的认可。其儿孙封在任城，死后享受较高规格的葬制。由此，体现了孔孟之乡、邹鲁之地在最高统治者的眼中，非同其他地区的重要地位。

汉代是济宁地区经济发展的兴盛时期，随着汉王朝统治基础的日益巩固，特别是西汉前期实行了“休养生息”和“大一统”的政治经





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据《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稟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漏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出现了整个封建社会少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富庶景象。汉代济宁自然条件优越，人民“重厚多君子，好稼穡”、“俗俭嗇爱才，趋商贾”<sup>[1]</sup>，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科学技术不断改进创新，农业和手工业尤为发达。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地主庄园经济，又对封建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故而济宁经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呈现出封建社会富庶文明的景象。

汉代济宁生产力水平在全国属先进行列，主要表现在牛耕更加普遍，铁农具改进和推广。汉初，牲畜比较缺乏，一般农民只得用人力耕作。为了促使耕畜繁殖，汉政府下令禁止宰杀耕牛，规定杀牛盗牛者受重刑。到汉武帝时，在黄河流域牛耕逐渐盛行起来，也有用马耕地的。古泗水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牛耕起源地，在汉代仍属发达地区。从济宁、枣庄至江苏徐州的诸县市都发现了汉代牛耕画像石，其中以滕州（汉鲁国蕃县）出土的最多，牛耕表现方式和犁的形制结构基本一致，说明牛耕技术是相通的。在汉画像石“牛耕图”中可见牛耕有三种方式，即二牛抬杆式、一牛挽犁式和一牛一马挽犁式。滕州宏道院牛耕画像石为一牛挽犁式。画面上，一农夫扶犁扬鞭，一孩童在前牵牛，一牛挽一具双辕犁，说明犁铧改进，重量已经减轻，更加锋利。这种短辕一牛挽式较长辕二牛抬杆式操作灵活，便于小块农田上耕作。滕州黄家岭牛耕画像石为一牛一马共挽一犁，可见马在邹鲁已用于农耕。其犁的结构由铧床、柱把、横木、系带（或绳）组成，系带在辕的两旁，



牛耕画像石

可能当时已经使用穿牛鼻环的技术,以加强对牛的控制,而无需牵牛人。犁铧安装在犁床上,犁箭(契木)安装在横木与柱的连接处,以调节耕地的深浅。此画像石牛耕之后,还有一牛拉一件长方形木耙,其上一人站立操作,这种耙应是击碎土块和整平土地之用而新兴的。这都表明汉代济宁耕作技术已有很大进步。

农业生产的发展得力于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铁工具的改进,而铁工具的改进更是农业发展的见证。新中国建立之后,济宁地区的汉墓和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铁农具,其种类有犁铧、铲锄、耒耜、耨、耙等。这些铁工具较战国时期有明显改进创新,如大铁犁、宽刃耨、多齿耙等为前代所未见,犁铧、锄的形制也有几种,他们广泛地用于农业生产各方面,还为土地开发和兴修水利提供了条件,汉代铁器对本地区农业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农作物种植方面,据《史记·货殖列传》载:“齐鲁宜五谷桑麻。”当时的主要农作物包括粟、黍、稷、小麦、大麦、菽和大麻七种<sup>[2]</sup>。这些品种,在汉代济宁都有种植,但粮食作物以粟、麦、稻为主,其中数小麦种植发展最快,《淮南子·地形训》曰东方“其地宜麦”,当然包括济宁在内。汉代对这一地区的小麦种植也很重视,如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宿麦即冬小麦)<sup>[3]</sup>。黄河自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瓠子口久决未堵,“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济宁乃是灾区内种宿麦的重点地区。至于水稻,汉代济宁仅在河湖或水利充沛区种植,如秦彭为山阳郡太守时,利用“穿渠灌溉”工程,“兴起稻田数千顷”。

桑麻是汉代济宁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在邹鲁地区早有种植。据《史记·货殖列传》载:“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汉书·地理志》也说:“鲁地,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麻泽之饶。”可见邹鲁以盛产桑麻而闻名。《史记·货殖列传》论各地物产,唯有“齐鲁千亩桑麻”,表明齐鲁桑麻的种植量居全国第一。

两汉时期,济宁地区手工业中的纺织、冶铁两行业异军突起,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济宁从先秦时代起,一直是全国纺织业发达地区之一。史载:“邹鲁滨洙、泗,颇桑麻之业。”“鲁缞”曾是济宁地区





的名牌产品，它产生于战国，盛于汉唐。“缟”是一种极薄的素绢。《淮南子·说山》云：“矢之于十步贯兕甲，于三百，不能入鲁缟。”《史记·韩安国传》也载：“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可见“鲁缟”质量之优。

《集解》引许慎曰“鲁之缟尤薄”，而《汉书》也注曰：“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故以取喻也。”可见“鲁缟”极富轻、薄、细之特点。反映了以“鲁缟”为代表的邹鲁丝麻纺织业的先进水平。

任城亢父是汉代山东三大纺织手工业中心，出产的丝、麻织品畅销全国，其中的“缟”还远销国外。20世纪，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在敦煌发现任城亢父缟上面还有题字：“任城亢父缟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尺，重二十五两，值钱六百十八。”这里的丝织品竟沿丝绸之路外销，反映出汉代济宁纺织业的发达及其产品的对外知名度。

汉代纺织技术较为先进，已经普遍使用了纺车、络丝、摇纬和脚踏织机技术，织机上有捏花装置，尤其是脚踏和捏花技术比欧洲早几个世纪，无疑是对世界纺织业的重大贡献。滕州（鲁国蕃县）龙阳店画像石“纺织图”中表现了络丝、摇纬、织布的操作景象，嘉祥、邹城画像石中的孟母、曾子教子故事图，也有斜织机的图像，这种脚踏织机和手摇纺车的结构与新中国成立前农村使用的极为相似，反映了汉代济宁纺织工具的进步和纺织业的先进水平。

汉代济宁地区冶铁业亦十分发达，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设铁官49处<sup>[4]</sup>，济宁地区就占了2处，即山阳和鲁县。东汉时在山东设铁官5处，济宁地区占了一处，即鲁国鲁县。和帝时盐铁开禁，冶

铁业多为豪强地主私营。

济宁地区著名私营冶铁业主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贯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



冶铁锻打图

趋利。”<sup>[5]</sup>可见济宁私营冶铁业在当时影响之大。自汉武帝设铁官后，对济宁冶铁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山阳、鲁县乃成为重要的冶铁基地。西汉成帝时山阳曾发生铁官徒苏令率280人起义<sup>[6]</sup>，铁官所用刑徒之多，可见山阳冶铁作坊具有一定规模。山阳郡铁官管理的冶铸作坊不仅在本郡内，而且还跨入周边郡国。1960年，在滕县（鲁国蕃县）薛故城中央发现一处较大的冶铁遗址，出土的铸范上有“山阳二”文字<sup>[7]</sup>，这应是山阳郡铁官处管理的第二铸场。1922年在莱芜兖省庄也发现带有“山”字的铁范，很可能是山阳郡铁官的冶铸标识。由此说明，山阳郡铁官具有很大的冶铸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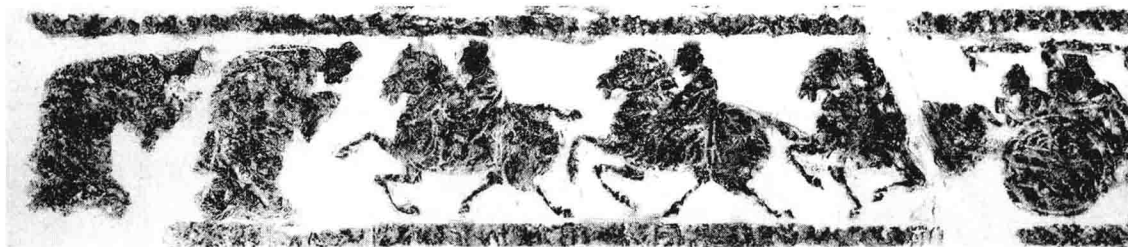
鲁国冶铁业也相当发达。1978年勘探鲁国故城时，在曲阜北关及盛果寺村南曾发现两处战国秦汉时期的冶铁遗址，其作坊冶铸时间长达数百年，面积较大的一处约5万平方米。内含大量铁渣、铁块、硫渣、炭灰和烧土，并发现多处圆形炼炉窖穴和灶址<sup>[8]</sup>。冶铁业的发展当与鼓风设备的发明改进密切相关，汉代鼓风机进步推广，性能大有改进。春秋战国时期，冶铁已使用了鼓风机——橐。到秦汉时期，邹鲁冶铁业普遍地使用了先进的鼓风机。1930年，滕县宏道院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幅“鼓铸图”，图上共十个炼铁工人，左布置一椭圆形的牛皮风囊，有两人在鼓风，两人待替换。风囊吊挂在屋梁上，炉子看不见，可能在地下，人们利用推拉皮囊送风。除鼓风机旁的四人外，中部三人做打铁状，中间竖立一个钻子，有的拿小锤、有的拿大锤，轮番捶打铁件。右部有的人在观察刀剑的锋利程度，有的人往水里蘸。滕县黄家岭画像石上也有制造刀剑兵器的作坊。他们均形象地描绘了邹鲁冶铁作坊的劳动景象。汉代济宁官营和私营冶铁业的兴盛，冶铸技术的进步，为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充足的铁器。近三十年来，任城、曲阜、微山、泗水、邹城诸县市均出土有汉代铁制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兵器。说明铁器已被广泛使用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汉代济宁是全国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史记集解》引服虔语曰：“邹鲁滨洙、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盐铁论·少耕》说：“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当时的著名商人为鲁人曹邴氏，他除“以铁冶起，富至巨万”外，还“贯贷行贾遍郡国”，致使邹鲁一带“以其故多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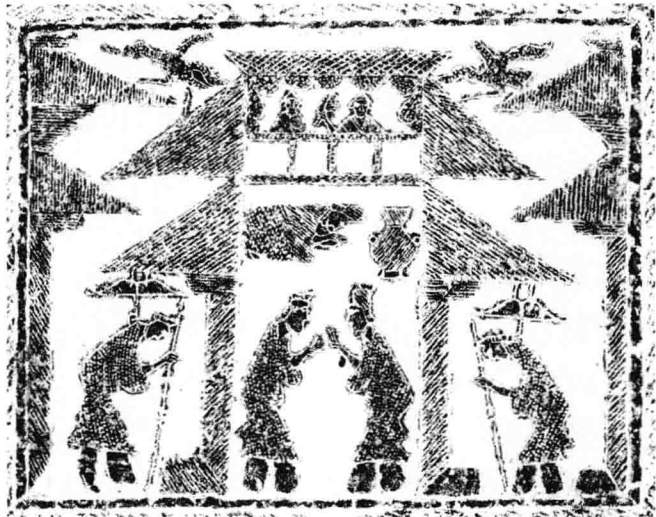
文学而趋利者”<sup>[9]</sup>。当时商业经营范围也很广，尤以当地或外地的农业、手工业产品为大宗，《史记》所提到的商品交换包括粮食、盐、纺织品、铁器、漆器、玉器、陶器、牲畜、皮革、水产品等几十种，可谓商贸兴盛。汉代济宁有些农产品畅销全国，有的还远销国外，如前面提到的山阳郡的铁范和任城区亢父缣。而外地的产品如盐、玉器、漆器等又输到了本地，方便并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形成和出现，是汉代封建农业经济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汉王朝本身就是豪族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以皇室为代表的地主贵族集团。刘姓侯王封地大，赏赐多，收入优厚，还私置产业，成为封域内占首位的豪强，如西汉鲁恭王刘馀，食邑六县，好治宫室，营造了著名的灵光殿。再如东汉东海恭王刘强，食鲁、东海 29 县（侯国），成为封域内政治、经济特权势力最大的地主贵族。山阳高平（今邹城西南）人仲长统，曾以他亲眼目睹的情况介绍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称贮，满于都城。奇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逐，山谷不能受。”他们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与中央集团抗衡的力量。东汉宦官山阳防东（今金乡西南）人侯览，“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谄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万计……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居，制度重深，僭类官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压良人，妻略妇子……小黄门段家珪在济阳与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侵犯百姓，却虏行旅”<sup>[10]</sup>。这些都是对豪强势力与地主庄园的真实写照。



独山村出土车马出行画像石

济宁的地主豪族势力出现在西汉时期，到东汉则成为左右本地政治、经济状况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对土地大多数采取田庄的经营方式，在巨大的田庄中，有农、林、牧、副、渔各业，还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的经营性质。同时，



北宿镇南落陵村出土建筑画像石

他们还养有家兵，史称“部曲”。如任城（今济宁）人吕虔，“蒋家兵守湖陆”以镇压黄巾起义，表现出东汉末期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反动性。

济宁众多的画像石墓及墓地祠堂建筑，是在两汉时期厚葬成风的社会风气大背景下逐渐产生的。究其原因，一是灵魂不灭的观念，“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sup>[11]</sup>。即把死人当作活人对待，迷信人死之后有另一个世界，鬼神和活人一样需要饮食起居，也就是所谓的“鬼犹其食”<sup>[12]</sup>。所以，对死人的供奉要和活人一样讲究，也即所谓“事死如事生”<sup>[13]</sup>。因此，把生活中需要的一切都带到坟墓里去，以便死后继续享用，即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sup>[14]</sup>。于是乎，当时出现“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櫛梓椁楠。良田造莹，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





崇侈上潜”<sup>[15]</sup>的不正常现象。二是在儒家思想中，孝道占有重要地位。诚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说：“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又由于汉代重孝，“孝”成了人们出仕入官的重要途径，而厚葬又是获得“孝”桂冠的重要手段，“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sup>[16]</sup>，故“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sup>[17]</sup>。于是乎，死者子孙以厚葬称孝，以达到炫耀争名之目的。而这种虚伪风气，使子为其父，妇为其夫竞相效仿，乃至一般“黎民慕效，至于废室卖业”<sup>[18]</sup>之境地。

两汉是济宁地区历史上的又一个文化发达时期，这里的汉代先民们，不仅继承了先秦邹鲁文化的传统，而且将其发扬光大，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环境下，使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得以较快发展，并达到了空前繁荣，在济宁乃至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济宁汉画像石就是在经济、文化、政治和思想及社会风气等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二、济宁画像石的分布、时代和分期

济宁汉画像石在各县（市）区的分布情况大致是：济宁市中区和任城区约 80 石。分布在原济宁师专、安居镇李村、市电力二处、古槐办事处、喻屯镇城南张、亢父故城、肖王庄、电器二厂、长沟镇张山、贾庄、黄楼等地。

嘉祥县约 230 石。分布在武氏祠、齐山、甸子村、洪山、宋山、花林、疃里村、嘉祥村、狼山屯、徐村、五老洼、西焦城、刘村洪福院、焦城村、杜家庄、城内小学堂、蔡氏园、郭家庄、秋胡山、峪屯、华林村、高庙、商村、程家村、隋家庄、郗家庄、吴家庄、吕村、洪家庙、七日山、南武山、纸坊镇敬老院、仲村、仲东村、十里铺等地。

微山县共 480 余石。分布在两城、微山岛、薄梁、昭阳、沟南、陈庄、独山岛、火山、黄山村、郗山村、青山村、谢桥村、西渡口村等地。

邹城市约 220 石。分布在黄路屯、王屈村、独山村、郭里、西郭村、下镇头、大故县村、羊场、南落陵、石墙村、邹城师范学校、八里河、王石村、金斗山、前营大闫庄、田家庄、柳下邑、簸箕掌村、高李村、

高庄、羊山、龙水、七里铺、稻洼村、野店、大束村、小东章村、庙户营、邹城面粉厂、南陶城、十里铺、县城乐关、西颜庄、卧虎山等地。

曲阜市约 160 石。分布在南辛、梁公林、董庄、孔林、徐家村、张家村、旧县村、西颜林、于家村、大峪村等地，另有 20 世纪 50 年代两城镇出土的一批画像石也收藏于曲阜。

汶上县约 18 石。分布在先农坛、老县城、曹村等地。

鱼台县约 20 石。分布在武台、鱼台县城西北部等地。

梁山县约 20 石。分布在茶庄、百慕山、后集、路庄等地。

金乡县约 38 石。分布在春城垌堆、羊山、胡集等地。

兖州市约 30 石。分布在农机校、徐营等地。

泗水县约 20 石。分布在县境内西南部。

上述各地出土或发现的汉画像石，以嘉祥武氏祠、嘉祥宋山小祠堂、微山两城镇数量最多。武氏祠有 44 石<sup>[19]</sup>，宋山小祠堂 40 石<sup>[20]</sup>，两城镇有 400 余石<sup>[21]</sup>。

现根据画像纪年、墓葬和祠堂建筑形制、随葬器物等因素，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试对济宁画像石作一个大致的年代界定，主要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末至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共六期。

第一期画像石以邹城龙水画像石墓<sup>[22]</sup>和微山岛石椁墓<sup>[23]</sup>出土画像石为代表。本期墓葬形制为简单的石椁墓，单室竖穴。石材粗糙，画像简单，以石材自然面稍作平整。出土陶器组合为鼎、盒、方壶，多有彩绘修饰，器形呈战国至西汉早期的特点。墓中出土仅为半两钱而无五铢钱。石椁画像，首先在头部、足部的堵石上出现圆璧、柏树，继而扩展到左右椁板上。左右椁板上以三角和菱形几何纹居多，一般多为同心圆对角线和穿璧纹，画面分三格，无边框。

第二期画像石以济宁师专 16、17 号西汉石椁墓<sup>[24]</sup>、微山两城 18 号墓<sup>[25]</sup>为代表。济宁师专 16 号，单室竖穴石椁墓，出土陶器以鼎、盒、壶、罐为组合，器形沿袭战国至西汉早期的风格，无明器。出土五铢钱为武、昭、宣帝时期的特点。微山两城 18 号墓，单室竖穴，出土陶器组合为鼎、壶，呈西汉早中期特点，五铢为武、昭、宣帝时期的特点。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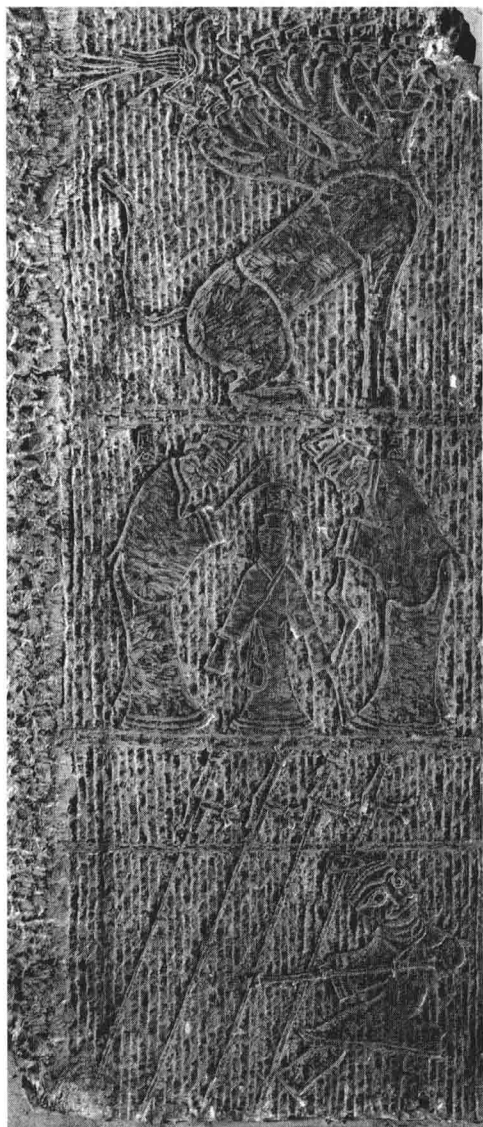


画像石特点：雕刻技法为阴线刻，画面分三格。开始有边框，打制平整，画面粗糙，未经打磨，画面一般刻在石椁室里面，亦有刻在石椁外面的。画像仍以几何形的装饰图案为主，以平面化穿插和交织为主要表现形式。开始出现人物活动场面，有简单的乐舞、车马、狩猎等图案，建筑物呈正面平视图，人物表现亦是图案化。边饰纹样有简单的直线和斜线组成的几何阴线纹。

第三期，以济宁师专4、10号墓<sup>[26]</sup>，济宁肖王庄西汉1、2号墓，

微山微山岛<sup>[27]</sup>、沟南，邹城南落陵、羊场、梁山等诸处画像石为代表。

天凤三年（16年）汶上路公食堂画像是地区年代最早有题记的画像石，早年出土，地点不详，现藏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师专4、10号墓，出土陶器为壶、罐组合，铜钱有磨郭、剪轮五铢。画像石开始出现凹面线刻，画面人物活物面增多，较师专16号墓出土的明显进步。济宁肖王庄西汉1、2号墓，画像石风格与师专4、10号墓完全相同，尤其是1号墓画像中的长袖舞造型与师专10号墓的如出一辙。微山微山岛（包括沟南）、傅村，邹城南落陵、羊场诸处画像石，画像人物众多，反映现实的内容丰富。整体风格与济宁出土的近似，但雕刻技法不同。济宁的大都凹面雕刻，而这里的大都阴线刻，应属地域上的差异。微山岛画像石原报告定为西汉末至东汉早期<sup>[28]</sup>，观其特点与济宁安居新莽时期画像石相似，其



武氏祠汉画像原石像之一

年代下限应提前至新莽时期为宜。而第三石画像中的“丧礼图”，与沟南的一块中格画像完全相同。由此推知，沟南画像的年代下限也在新莽时期。

本期画像石特点：雕刻技法以凹面线刻为主，仍有不少的阴线刻。画面仍分三格，画面人物活动增多，人物增加。人物皆平面罗列，姿态仍图案化，只能看出大的动态，细部无具体刻画，楼阁还是剪影式的正视图案。画像反映现实的内容有所拓宽，如肖王庄西汉1号墓画像中的“战争凯旋图”和微山岛画像中的“丧礼图”。反映历史故事的内容开始出现，如微山岛画像中的“泗水捞鼎”和“孔子见老子”等。不少画像的空白处往往填充飞鸟。边饰纹样往往刻意装饰，如肖王庄1号墓在界格之间和边框的角隅加有并列的菱形图案。整体看，本期画像疏朗、活泼、富有情趣。

第四期带有纪年的画像石有：永元八年(96年)，鱼台永元食堂画像；延平元年(106年)，曲阳三老食堂画像。本期以石椁墓为主，以嘉祥五老洼<sup>[29]</sup>、嘉祥村、徐村、纸坊、十里铺、洪山村<sup>[30]</sup>为代表，石椁并列多室增多，个别已向大型多室墓发展。墓葬地上开始流行祠堂建筑。嘉祥五老洼多室墓系用汉画像石材建造的魏晋墓。这批画像石已开始分层，边饰发达。车轮的前后纵深关系已有所表现，较前期有明显进步，但仍用凹面线刻技法。画像第三石刻有“丁卯”、“十一日”字样，据此原报告推测为孺子婴居摄二年(7年)或明帝永平十年(67年)<sup>[31]</sup>，即西汉末期或东汉早期的作品。微山岛万庄画像石风格亦与嘉祥的相似，层饰纹样为复合式，原报告推定为东汉中期或略早<sup>[32]</sup>，似为东汉早期偏晚的作品。

本期画像石特点：雕刻技法以凹面线刻为主，并有极少的凸面线刻和平面浅浮雕。画面表现形式突破以往的分格，开始出现按不同内容分层，一般2~4层，有的还利用楼层来划分层次，如五老洼第三石、疃里村画像石，分层非常巧妙。画像少数图案开始表现出前后纵深关系，如五老洼第一石第二层中后车隐约可见另外一个(里面)车轮，而前车辆只见一轮，这与以前的车轮刻画是一样的。画像内容丰富，除反映现实生活以外，历史神话的明显增多。边饰纹样亦较发达，一般为







2~4重不同的组合，如洪山村第2石边框有4重，纹样分别是斜线纹、斜线菱形纹、三角纹、水波曲线纹和垂幢纹，显得非常厚重、华美。整体看本组画像稳重、疏阔、有距度。

第五期为东汉中期，大致相当于和帝至安帝时期。画像石墓，一般为多室墓。本组画像所表现的前后纵深关系愈明朗化，并且发现了人物四分之三侧面刻画，神话故事内容亦较前组增多。某些散存的画像刻有明确纪年，为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微山两城以往出土的37石中，其中2石刻有“永和二年”、“永和四年”纪年。这批画像石无论雕刻技法、画像内容还是艺术风格，大都相同或相似，相对年代应在“纪年”或其前后。画像特点尽管与武氏祠石刻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整体风格迥异，明显存在先后关系。以微山两城诸画像石为代表，其特点是：雕刻技法以弧面浅浮雕为主，物像起伏处略呈弧面。画像承袭了第四期许多特点，并把纵深关系的表现较多应用到画面中，这首先表现在人物、马匹的重叠、遮挡和树枝的处理上。如两城永和四年画像，右起第三位侍者以堂柱遮住一半身体，而永和二年画像，则把连理树缠绕的盘枝之纵深关系刻画得很清楚。在人物表现上突破以前的正面和正侧面，出现四分之三侧面刻画。其次表现在车辆二车轮的明显增多上，如两城大多画像石同层画面中全部车辆均作双车轮刻画，骑吏马匹均重叠。构图上追求饱满，空白处飞鸟、怪兽填充更多，而飞鸟的表现往往是局部的。如永和四年画像，堂上右边框内只露出鸟头颈部分。画像内容继承了前期的特点，但神话内容的题材明显增多。边饰纹样趋向简单化，一般是2~3重较窄的阴线、水波组合。整体看，本组画像饱满、富丽、细致。

第六期画像石的年代大体在桓灵帝之间的东汉晚期。灵帝以后，本区画像石呈衰落趋势。本期画像中的车轮等图像，几乎全部体现出前后纵深关系，不少图像或整幅画面均采用三度立体空间来表现，人物四分之三侧面刻画较成熟，画像题材更广泛。本期纪年画像或墓共4处，年号皆在桓帝年间，而武氏诸祠堂分别建于桓灵帝之间，均为画像石年代的推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从雕刻技法和艺术风格看，宋山第一批、第二批（包括许安国祠堂纪年者）一部分、南武山、齐山、甸